



《第一财经日报》◎采编

中国书

我们作为中国人就一定了解这片大地，可是我们三十年就天然熟悉这段岁月？即便我们可能把握几成？太多的不解在心头，而我们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叩问——对话历史、深触当下。三十年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复制的大成就，它需要沉淀和反思，起于大刀阔斧地革命，凝结无数国人心血。行为需要一棵大树，如同那首散文小诗：橡果，橡果，不要果实和枝叶化为一个中体内和历史中的那些休憩的东西。自2007年底，当我们开始频繁地翻阅历史，还是自己脚下的土壤，找到大地视角、新视角。亲历过，睿智者是我信任的打铁人；未曾亲历，耳熟能详但未识得省份更多，更需多方。目通八极，书桌上的学者们分工不同的行为和思想。

我们于2008年正式刊发《第一财经日报》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刊，那是原安徽省委书

中信出版社·CHINACIT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中国的出路

28位省部级高官、学者谈经济发展与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采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出路 / 《第一财经日报》采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086-1461-8

I. 中… II. 第… III. 经济—研究—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6878 号

中国的出路

ZHONGGUO DE CHULU

采 编:《第一财经日报》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461-8/F·1562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听，历史的回声

是否我们作为中国人就一定了解这片大地？是否我们经历了 30 年就天然熟识这段岁月？即便我们生活于当下，但当下、以往和未来究竟对个体生命和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又把握几成？

太多的不解在心头盘旋，而我们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叩问——对话历史、深触当下、叩问时代——现在，您手中的这本书就是我们又一次出发，又一份努力。

改革开放 30 年无疑带来了人类历史上不可复制的伟大成就，它源于痛苦的现实和反思，起于大刀阔斧地革新，承自市场经济的再认识，迎来持续增长繁荣的中国奇迹。

不过，说是奇迹，其实无非也是无数国人用心血、行为灌溉出的一棵大树，如同那首动人的英文小诗：橡果，橡果，不要在意你现在的渺小；有一天，你也是一棵大橡树。面对奇迹，回首过去，我们发现更多的是真实和常识，是内化于每个中国人体内和历史中的那种生生不息的东西。

自 2007 年底，当我们讨论如何面对 2008 年时，我们也开始思索如何面对改革开放 30 周年纪念。无数的人们、纷繁的故事、庞大的历史，还有那么多的各类媒体，如何立足自己脚下的土壤，找到大地之声呢？如何通过发现真实和细节，舒展看似紧张的人与历史间的矛盾呢？

我们需要新视角、新事实。

亲历者和慧智者是我们的两个杠杆。前者主要集中于 30 年间虽耳熟但未必详识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他们多从基层走来，历经计划经济与 30 年变迁，向上可达中央和最高领导组织的会议，向下可到一村一厂，正是能打通上下现实的关节点；而后者更多是以彼得·格鲁克所言的“旁观者”身份出现于这段历史中的，虽然不乏政策建言乃至临时参与，但更多的时候是调研四方、目通八极、点

化勾线、躊躇满志的学者。两种看似分工不同的行为和思索，其实都交汇在中国大地上，而我们希望展现其中一二。

在经过半年多的调研后，我们于2008年6月正式刊发《第一财经日报》改革开放30年系列的第一篇，那是原安徽省委书记、江西省副省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黄璜回忆安徽农村改革之初，万里等同志制定“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政策，并在农民、干部推动下“就汤下面”——包产到户的真实历史逻辑。黄老以亲身经历为我们详细描述了一幅普通民众与各级干部共同书写成的历史画卷，真实明了，生动深刻，当年情景立显眼前。

虽然不少人说新闻是易碎品，可我们还是顽强地叩问大地和历史，希望多一分价值。在这个系列中，史料丰富，很多内容几乎为首次披露。如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杨波谈到的“1978年开计划会议时，各省市都交了一份书面意见”，此内容少有披露，应为中央地方关系研究的重要史料。

又如原福建省省长、商业部部长、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详细回忆了70年代末设立经济特区前，广东、福建两份申请报告的情况，及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的厦门特区题词。听到他谈及曾经海峡两岸渔民行至中流，以黄花鱼换取电子表，相笑而返的故事，我们心中无尽感慨。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纪念改革开放30年同样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当下和走未来的路。我们在口述史中和记者手记中都体现了对当下经济、社会的关注。如原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钟起瑞谈他所经历的三次通货膨胀和治理、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谈90年代末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更与2008年经济现实和宏观调控难题不可分割看待。

2008年，太多不平凡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上溯30年亦然。而面对2009年建国60周年纪念，面对下一个30年，不但需要前行实干，也应存反躬深思。我们这本书，就是希望提供一些并不遥远的历史细节、事实和思考，那是我们共同的岁月。

朋友，历史也有回声，翻开这本书，听吧……

秦 朔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VII	序言 听，历史的回声
1	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回忆安徽无为县农村改革 从“借地度荒”到包产到户
11	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杨波回忆改革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 1978年西行记
21	原四川省计委副主任刘兆丰、原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林凌回忆扩 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与首钢承包 “一块石子入池塘”
31	原四川省经济学会副会长袁文平回忆学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概念萌发 让价值规律改变“棉花站岗，红薯睡觉”的土壤
41	原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张毅回忆乡镇企业改革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前前后后
51	原江苏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邹国忠谈苏南乡镇企业 再解苏南 建议成立中小企业总局
63	原深圳市政协主席周溪舞回忆深圳特区设置之初的经济体制改革 从打破“铁饭碗”到取消粮票
73	原福建省省长、原国家商业部部长胡平 改革开放的回忆

83	原商业部副部长张世尧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商业体制改革 流通体制改革如何落子
93	原国家物资部副部长陆叙生 价格双轨制“跷跷板”：中国企业首次集体感受市场魅力
101	原深圳市市长郑良玉回忆深圳证券市场建立前后 证券市场，从考验中走来
112	原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钟起瑞 我所亲历的货币信贷体制改革和三次通货膨胀
129	原财政部部长、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 回顾中国财政改革 15 年
140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 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不能延缓
148	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秦池江 市场、政策“两手抓” 农村金融迎最好发展机遇
16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原央行非银司司长夏斌 信托业大整顿“整”出的金融强国改革发展逻辑
174	原上海市副市长庄晓天、原上海计委副主任裴静之的资本市场回忆录 上交所成立始末与法人股 B 股的由来
185	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 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农村
189	原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江波细数蛇口改革开放成功经验 大胆改革，大胆用人，大胆创新
198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之路
20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 宏观调控 30 年 警惕“超短期化”
213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中国奇迹”谜底是行政体制改革
220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 不能因过去 30 年好环境而低估全球经济周期调整

- 229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
我倾向用“自主制度创新”而不是“转轨”描述改革 30 年
- 23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
战略性行业不能被外资控制
- 249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
30 年农业改革 实质化解粮食安全困扰

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回忆安徽无为县农村改革 从“借地度荒”到包产到户

1978年开创了中国又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的起点是广大农村，是亿万农民，而安徽无疑是农村改革的急先锋。

在安徽，农民推动改革的同时，“省委六条”与“借地度荒”等措施直接提出或鼓励了一系列超前做法。

黄璜同志曾于1983~198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之前在基层工作多年，并于1978~1979年任无为县委第一副书记，参与领导了该县的农村改革。他和领导及同事在“无为”共求“有为”，努力破解“无为”二字。

时隔30年，2008年1月和6月，现年75岁的黄璜同志在北京家中数次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回忆了无为县的往事。

“省委六条”

《第一财经日报》：据您的观察和体会，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安徽农村的整体状况如何？

黄璜：那时正处于“文革”中，虽“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声震天动地，但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难民比比皆是，就是地处江淮丘陵的合肥周围，来自凤阳、定远等地的逃荒要饭人群也是络绎不绝。那时我正下放在临近合肥的肥西，充当“五七战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农民和灾民常有接触，对他们的处境感受至深。

安徽这种状况的产生，不是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不是干部不干事，也不能说老天存心不帮安徽人民的忙，而是在于极“左”路线的翻版——“两个凡是”

的影响，这才是种种苦难的根源。

我是1953年从上海调进安徽的，曾在省、地机关和县、区、社的多个岗位上工作过，和基层干部群众有广泛的联系，比较了解他们，他们多是敢为天下先、能干大事的人。

《第一财经日报》：百姓后来都说“要吃米，找万里”。万里同志到安徽后和战友们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推行农村改革吧？

黄璜：对。粉碎“四人帮”第二年的6月，东山再起的铁道部原部长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组建了新的省委，除了调进顾卓新、赵守一等担任省委领导外，长期在安徽担任省委领导工作的李世农、张恺帆和王光宇等同志也“官复原职”，他们都是安徽农村改革的发起人，也像万里同志那样，在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形象。

在万里同志的多项决策中，最为突出的是推行农村改革。

改革的初始阶段是以省委在1977年11月7日下发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为依据的。该文件简称为“省委六条”，其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其二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其三是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其四是允许和鼓励社员保有自留地并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五是搞好经营管理，生产队可以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只要个人就能完成的农活允许责任到人；其六是生产队干部带头参加劳动。文件的总体精神既符合党中央1977年49号文件规定，又在许多方面有新的突破，更为接近安徽农村的实际，是一份为农村松绑、推动农村改革的重要文件。文件下发之后，干部群众争相传颂，赞不绝口。

见万里

《第一财经日报》：“省委六条”出台后的第五个月，省委派您到无为县，担任县委第一副书记。您上任之前万里同志向您嘱咐了些什么？

黄璜：1978年4月的一天，已恢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赵达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去他办公室，说有话跟我讲。他是我尊敬的老领导，又是“文革”期

间的难友，找我这个已离开省委组织部多年、时任省上山下乡办公室处长谈话，一定有急事相托。我如约而至，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他告诉我：“省委很重视无为县，已为该县选任了一位县委书记。这位同志是从大队上来的，工作表现不错，但未在县里工作过，要他主持一个县的工作还有待学习和提高，需从省里直派一个曾在县里担任过领导工作的同志去协助他开展工作。我们商量的，认为派你去比较合适，已报省委研究同意。走前，万里同志还要和你谈一谈。”

赵副部长陪我去见了万里同志。他刚开完会，还未离开会场。我们进去后，他先问赵，你都说了吗？赵回答后，万里同志没再询问什么情况，也未提及“省委六条”，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着重讲了无为是革命老区，是在全省有影响力的人口超百万的大县，历届省地委领导都很重视这个县。他说，最近，省委已任命付昌堂同志为县委书记，他是从大队书记上来的，人不错，年轻能干事，你去协助他，共同扭转无为的局面，将无为搞上去。现在，正是春耕生产季节，要抓紧去，先去抓生产救灾，千万不要饿死人，必需的粮款，由省里拨给。领导的心情和季节的紧迫，确实是不能再拖延了，我只得匆忙赴任。

从“借地度荒”到“就汤下面”

《第一财经日报》：您之前对无为县是什么印象？

黄璜：无为地处长江中游北岸，与芜湖近在咫尺，离合肥也不远。我过去去得少，算不上熟悉，但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起因就在强加在前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身上的所谓“大闹无为”事件。

1959年，在“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盛行的安徽，“饿、病、逃、荒、死”十分严重，仅死去的人就以数百万计。无为既是个重灾区，又是张恺帆的故乡，他亲到无为检查工作，目睹父老乡亲含泪陈情，当即采取了种种救济措施，但此举却被科以“大闹无为”的罪名，受到极不公正的处理。每当人们忆起张恺帆，我就联想到无为，总是对张恺帆和无为有一股亲近感。

接我去无为赴任的是无为籍老司机朱立鹏同志，他欢迎我，还主动给我介绍

了无为的一些情况，并谈了他的一些看法。在他看来，无为是比较复杂的，但也不是难有作为的地方，他殷切地希望我去破解“无为”二字，多做有为之事。我何尝又不是这样一种心态呢！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有个很重要的决定是“借地度荒”，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之后农民“还地”了吗？

黄璜：那时的无为县，在传达贯彻“省委六条”后，各方面都有了起色，继续争取有所作为是可能的。但是，持续的干旱，从冬春直至初秋，是为无190多年来所少见，大部分农作物错过了最佳播种季节，已种的也是严重歉收，甚至绝产。面对又一个灾年，干部群众都忧心忡忡。

正在此紧急关头，万里同志亲到无为，一是筹划“引江济巢”抗大旱工程，要在无为的凤凰颈安装四百台大型灌溉机械，抽长江水入巢湖，抬高巢湖水位，为江淮丘陵提供抗旱水源。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动作，绵延数公里的场面十分壮观。

二是宣布省委的“借地度荒”决定。这是省委紧接“省委六条”后又一次采取的对农村问题具有破题意义的特殊政策，主要是借出一部分集体耕种的土地让社员自由种植；鼓励社员在开荒地和“四旁”空闲地种粮种菜，收益一律归己并不计征购。

“借地度荒”在一部分县区干部的心目中只是危难之时的权宜之计，始终没有太大的反响，而在农民群众的心中则是另一种感情，并带有变革性的期盼。对群众的愿望，县委一班人心知肚明，都主张放宽些，多借点。当时也确实是多借了点，一些人多地少的生产队，由集体耕种的土地已所剩无几。

1979年初春，在“借地度荒”中受益的农民，不仅不准备退还耕地，还纷纷要求“就汤下面”，以户承包，并保证完成各项上缴任务。

实践中的醒悟

《第一财经日报》：这些政策和情况在当时都是比较超前的，您不担心被批判吗？

黄璜：以户承包，责任到户，我1961年在望江县委工作时就亲身经历过，确能增产，深受群众的欢迎，但好景不长，数月后就被上级领导完全否定，有的同志还因此而受到批判和处理。从那以后，许多同志的“恐资症”更为严重，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真正有所醒悟是在1978年初夏去黄姑公社做农村调查之后。当时，正在稻场上忙碌的社员见到我，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土地承包到户，我随即反问他们：“你们就不怕资本主义吗？”一位中年社员随即放出一句话：“我们社员只知道搞饱肚子。”话虽不多，却极为真诚，对我触动很大，我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越想越觉得有道理，颇有豁然开朗之感。

我早年在上海工作时，曾到过著名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参观过荣毅仁家族的纺织厂，不要说让农民去弄懂这些企业运作，就是叫我去，也是很吃力的。农民想干的事干部不支持，这是个什么问题？原来是我们患上了“恐资症”，是我们这些人怕犯错误，因此放不开手脚，不能和农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想多了，也想得更深了，终于醒悟了。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和当时您协助工作的无为县领导付昌堂同志聊过，他对1979年的试点记忆犹新。您能谈谈具体情况吗？

黄璜：1979年初，县委一班人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决定在红庙公社凉亭大队由付昌堂同志亲自搞试点，我和县委部分同志都参加了。昌堂同志的群众基础好，很多群众在关注他，他的这一举动传播得既快又广，还未等试点出经验就传遍了全县，部分社队也动了起来。

有贯彻“省委六条”的工作基础，又有“借地度荒”的实践，加上1961年“包产到户”的轻车熟路，各区社的行动都很快，仅两个多月的工夫就大头落地。动得快，不误农时，这是当时农村工作的大局，也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但也出了不少问题，有累死耕牛的，有为抢水而斗殴以致损毁水利设施的，还有伤及土改运动成果的。这些大多属于有待完善的性质，总体上还是健康的。

《第一财经日报》：面对这些问题，当时肯定有不少同志对改革提出反对意见，您和同事们具体怎么对待这些意见的？

黄璜：广大农村热火朝天，热闹非凡，而在县直机关则是议论纷纷，众说不

一，有赞扬默认的，也有批评和强烈反对的。县委经研究后认为，有必要加强县直机关的工作，不能让“后院起火”，并委托我来操办这件事。

在当时，操办这样一件事是有一定难度的，最大的难度来自个别部门的领导和个别新闻单位以及部分省直机关的负责同志，他们的舆论观点已严重脱离农村实际，但有一定的杀伤力，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为此，我曾去肥西县考察，他们是先行者，想吸取他们的一些经验和做法。那时的肥西是全省争论最激烈的县，也是越争越坚强的县。据时任肥西县委书记的常振英同志讲，他准备以政府布告的形式支持农村改革，这对我又是一次大的触动，更加坚定了我的思想。

在此以后，我几乎是每周召开一次科局长会议，反复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号召依据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去看待事物和形势，紧跟时代的步伐。与此同时，根据万里同志的指导思想，针对“恐资症”，我谈了自己的理论思考和思想转变过程；针对联产承包，我强调分清是非界限，不要将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上纲上线为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已发生的问题，我突出做好完善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县直机关的干部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仅与人民群众有联系，还比较了解群众，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始终是他们判断事物的重要依据。在群众的感召下，特别是在吃到亲属送来的当时还很紧缺的粮油后，奇谈怪论也就大大减少了。

效果与经验

《第一财经日报》：当年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

黄璜：说一千道一万，都必须落到实处，尤其是要让农民增产增收。这一年，全县各个方面都有所恢复和发展。在粮食生产方面，首次突破10亿斤大关，比上一年增长12%，油料增产45.1%，国家收购粮食3亿多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在房屋的升级换代方面也是空前的，其中砖瓦房由原来的不足20%提升到40%以上；外流劳力纷纷返回农村，这在当时也是可喜的现象；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形式更似雨后春笋。城乡生机勃勃，处处是充满希望的景象。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回忆30年前的往事，您认为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

什么？

黄璜：深刻理解一项大的变革，要有个认识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因人而异，但都不可逾越。安徽的农村改革已过去了30年，各方面的变化极为巨大，不可同日而语。那难有作为的无为已连续八年进入全省十强县行列，区域经济综合实力也连续两年进入中部地区的百强县之列。在30年后的今天，应该是我们共同而又深刻地理解这场改革全部意义的时候了。

它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开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能力，致富了农民和农村，进而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全国各条战线的改革开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不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依据科学发展观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坚持开放思想，发扬探索精神。在这两个方面，要下真功夫，不能以口号代替行动。

在安徽，无为的农村改革不是最早，但也不是坐的“末班车”，它与肥西、来安、凤阳等县都同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也都名列前茅。在那个极“左”思潮尚未肃清的年代，它们能共同走在全省70多个县的前列确实不容易，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也超出人们所料，人们至今还深情地追忆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更在情理之中。

深情的回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依据科学发展观去展望未来，继续向前看、向前走，也是我们的一种情感和努力追求的目标。作为农业大国，我们应该把一切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民、农业和农村，按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去推进改革、扩大开放。

田毅 / 采访整理

黄璜



- 1933 年出生，江苏省涟水县人。
- 1946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 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新中国成立前在华中和山东战场从事战地救护、文艺和机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调至安徽，曾任中共安庆地（市）委统战部干部科副科长、望江县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一级巡视员等职。
- 1969 年，被下放安徽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1972 年，回省分配工作，任省革委会知青办党组成员、宣传处处长。
- 1978 年后，历任无为县委第一副书记、六安地委常委、霍邱县委第一书记等职。
- 1983 年 3 月，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
- 1987 年 6 月，调任江西省副省长。
- 1989 年 12 月至 1997 年 8 月，调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书记兼宁夏军区第一书记。
- 1998 年 3 月后，任全国政协第九届、十届常务委员。
- 为中共第十二届、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历史细节中的真实逻辑

30年，从头越。这个初始当然是农村改革。但当《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今年初开始寻找这方面的脉络时，却时常陷入大量资料中无法自拔，我们不断自问，丰富的资料究竟体现着怎样的历史逻辑？

有一天，偶然找到中共安徽省无为县委原常委朱先央同志，他告诉我们，从1978年9月到1979年12月，在无为县实行大包干的起步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万里同志先后三次到无为县视察，并说：“我要把无为作为推行大包干的联系点。”

朱先央同时谈起农村改革之初任无为县第一副书记，后来任安徽省委书记的黄璜同志，说黄书记屡次督促自己写写20世纪70年代末无为县开始实行农村改革的情况。

于是，我们找到了黄璜老书记，黄老细致耐心而深情的讲述，仿佛给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向往昔的大门，其中，关于1978~1979年他经历过的无为农村改革过程尤为引人入胜，30年前的历史之音清晰可闻。

如果说当年大旱是外部大灾，那么，农民兄弟和领导干部不但没有盲目应对，而且还针对旧有困境，开创出一条现实而意义深远的道路。安徽省委的六条政策奠定了这个基础，有记载说当时一些干部向农民传达六条政策时，会场上鸦雀无声，念了一遍，农民还要求再念一遍。而“借地度荒”则在现实中打开了关键通道，在增产增信心的时候，农民都不愿归还土地，而是“就汤下面”——包产到户了。

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9年6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与万里同志谈话，就他汇报的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一事，发表意见：“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①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531页。